

· 文學研究 ·

啟蒙的願景

——蕭軍《五月的礦山》中的歷史記憶*

楊 慧

[提 要] 蕭軍在其取材於撫順礦務局工人生產競賽的長篇小說《五月的礦山》中，將主人公和二號人物分別命名為“魯東山”和“楊平山”，前者指向山東底層民眾“闖關東”的集體記憶，後者銘記著有“東北淪陷後第一慘劫”之稱的撫順“平頂山慘案”這一歷史事件。通過發掘東北民眾深受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苦難記憶，作家揭示出東北近代以降獨特的歷史命運，進而將這一苦難記憶轉化為中華民族共有的歷史記憶。而將培育擁有健全靈魂和充滿生命活力的民眾作為“在思想上武裝我們底人民”的方法，則又彰顯出蕭軍蘊含在這一歷史記憶書寫之中的經過革命洗禮的啟蒙理想。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最為重要的“他者”之一，蕭軍本人或許就是一個不無挑戰性的“歷史記憶”，構成了另一個頗具現實性的重要議題。

[關鍵詞] 蕭軍 《五月的礦山》 平頂山慘案 歷史記憶 啟蒙精神

[中圖分類號] I2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3)04-0134-13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蕭軍長篇小說《五月的礦山》中的歷史記憶，尤以該書之第四章《千家山——仇恨底歷史》為探討的重點。在這個迄今為止幾乎從未得到學界關注的議題當中，我們再次感受到了蕭軍文學和思想的豐富性與複雜性。概言之，這部命運多舛的小說，寄寓著蕭軍一以貫之且不斷得到現實淬煉的啟蒙理想，這一理想在書中那些勇敢揭批官僚主義的情節中得到了直接的體現，不過比之於這種批判性的“破舊”，作家在書寫與東北有關的歷史記憶時所展現出的同情與理性，或許更具“立新”意義上的建設性，同時也為我們理解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最為重要的“他者”之一的蕭軍，提供了新的角度和依據。

回到文本生產和流傳的語境，可見這部創作於 1951 年 6 月至翌年 4 月間，^①但遲至 1954 年 11 月才在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牌）付梓的小說，實為彼時中國文壇為數不多的工業題材作品之一。然而，《五月的礦山》這部同樣“為社會主義工業化服務的作品”却並沒有因為“物以稀為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關內‘東北’敘事與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1912-1945)”（項目號：21BZW031）的階段性成果。

貴”而受到歡迎，不僅在出版之前曾經遭遇長達兩年之久的“難產”，在出版之後更是不斷遭到無理的誹謗和惡意的中傷，並且成為作家最終被逐出當代文壇的重要原因之一。綜觀彼時中國文學中並不多見的工業敘事，書寫個人或集體的記憶以便呈現今昔/新舊的社會對比以及人物的思想轉向，其實是一個不足為奇的常見現象。然而在文本中發掘和重構一個地方/區域的歷史記憶，並將其作為重要的敘述動力乃至主題之一，這在彼時同類作品中幾乎絕無僅有。由此或可思考，蕭軍在小說中對於歷史記憶的書寫，是否是導致其陷入悲劇命運的“異質性”因素之一。

在以往有關記憶的經典研究中，歷史往往是作為記憶的對立物存在，^②因而“歷史記憶”往往被界定為以歷史為主的諸學科的記憶，並將其與更具本真意義的“集體記憶”或“功能記憶”對舉，指認其因為過度追求“真理意志”而淪為“無人栖居的記憶”。^③不過，正如有當代西方學者所論，“所有的記憶，不管是‘個體的’，還是‘集體的’，或是‘歷史的’，都是對某些（廣義上）深含政治目的的事物的記憶”。而歷史（學）最重要的工作恰恰是自我解構式的，它以自身特有的“異邦性”不斷地提醒著“大眾消遣者和職業歷史學家，他們所建構的只是當下的模式，而不是過去本身”。^④因而，本文所使用的“歷史記憶”一詞，其核心要義同樣是在呼喚一種促使文本自我解構的方法，借此揭示蕭軍在建構這一記憶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壓力、競爭、調試與抉擇。

一、“未好的瘡疤”

從蕭軍在《五月的礦山》中對於主人公魯東山的命名中，讀者似乎不難聯想到大山般的厚重與崇高，以及“東山再起”的期盼和喜悅。不過從姓名解詁的角度來看，“東山”又可視作“山東”的倒文，並與“魯”形成對文，起到同語反復的強調作用，共同指向“山東”這樣一個地理空間，而隱身其中的則是有關山東底層民衆“闖關東”的歷史記憶。不必一一考證小說人物的籍貫和出身，儘管敘述人對此多有詳略不同的交代，比如主人公魯東山就曾不止一次地回憶起自己在“山東家鄉”參加游擊隊抗日的經歷，^⑤我們僅從很多礦工咬著煎餅當“早餐”或者“午餐”這樣一個細節，^⑥就可看出此地山東人不在少數。這其實也是蕭軍對於“生活事實”的實錄，比如魯東山的原型人物、撫礦“勞動英雄”張子富就是山東莒縣人，“二十二歲參加山東一支二團抗日游擊隊”，1941年2月在江蘇盩厔縣出便衣任務時“被日寇所俘，解至大連，脫逃，後充碼頭工人，八·一五解放後到撫順露天掘（引者按，即西露天礦前身）做裝煤工人”。^⑦另據作家在1949年5月13日記載的一次有關老虎台礦“採煤第二班”的“審查登記”的結果，這些工人“大部分為山東，博山等地人，農民出身”，^⑧而這也基本上反映了彼時撫礦礦工整體的人員構成狀況。

雖然蕭軍在這些礦工“闖關東”的經歷上著墨不多，但是通過點染東北光復以前他們在烏金煤礦（原型即撫礦前身、成立於1907年的“滿鐵撫順炭礦”）的苦難遭遇，還是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的罪惡行徑，為工人們在解放後的新生活提供了可資對比的生動背景。比如小說中在“礦山工作過二十年，經過了幾次大傷害”的“啞巴嚴百歲”雖是一個出場不多的次要人物，却以自己因多次工傷而造成的身體殘疾，成為一個“無聲”但有力的控訴者。^⑨抑有進者，敘述人還曾藉助魯東山的回憶，呈現其“公開打過日本採煤班長”的抗爭，並揭露過去礦山“隨便一個日本職員，全可以把工人們象一只狗似地打死丟進山南的‘萬人坑’裡去餵狼”的罪行。^⑩然而，張子富其實是在1945年抗戰勝利後才進入撫礦，並未經歷過“滿鐵撫順炭礦”時代，作家的這一“虛構”，顯然是出於建構魯東山“見證者”身份的考慮。因而，通過刻畫這些“闖關東”而來的礦工早在全面抗戰乃至“九一八”事變之前就已陷入的苦難境遇，蕭軍為自己的小說開掘出更具歷史縱深感的思想

視野。

另據前引魯東山在山東家鄉參加游擊隊抗日的經歷,可見其最早也是在 1937 年全面抗戰爆發之後才來到東北,趕上的應該是“闖關東”大潮的“尾聲”,可謂“新”東北人。與之相比,小說二號人物楊平山則是土生土長的“老”東北人,不過很有可能也是“闖關東”先民的後代。魯東山與這位曾多次因“從崩岩下搶救電鏟出了險而負了傷”的電鏟(電鎬)司機,雖然只是“新認識不久的朋友”,^①而且並無工作和事業上的深刻關聯,尤其是就小說而言,楊平山甚至在魯東山之外構成了相對獨立發展的另一條敘述線索,但這些都不妨礙兩者互相理解,彼此鼓勵,從而結下了兄弟般的情誼。顯然,就小說的敘述邏輯來看,“新”東北人魯東山特別需要“老”東北人楊平山的友誼,因其隱喻/預示著一個不分畛域的“新東北”即將作為“新中國”至關重要的一部分而誕生。而這或許就是小說需要魯東山完成的更深一層的見證。

蕭軍在 1949 年 5 月 17 日的日記中寫道:“如果作為文學背景來描寫的話,露天掘是比老虎台更好些,……人物張子富可以做個模特兒的。”^②而這也是我們在蕭軍日記中發現的有關《五月的礦山》人物形象塑造的最早記載,可見作家最先確定的人物“模特兒”就是張子富,其核心身份是勞動英雄,並突出體現了小說所表現的大工業生產的主題。而到了當年 7 月 7 日,蕭軍又決定“選一個青年工人,曾被平頂山慘殺者”作為未來小說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不過“具體模特還未選好”。^③所謂“曾被平頂山慘殺者”,指的就是日寇在 1932 年 9 月製造的撫順“平頂山慘案”中的幸存者,楊平山這一人物即由此發展而來。如前所述,《五月的礦山》第四章的題名就是《千家山——仇恨底歷史》,而人們只要對平頂山慘案稍有瞭解,就會看出小說中“千家山”就是“平頂山”的代稱。正是沿著這一思路,蕭軍將“平頂山慘案”——用當年《大公報》“社評”的話說,此乃“東北淪陷後第一慘劫”,^④嵌入到文本的深處,將其作為推動情節發展的重要動力,並且以此為主建構了小說發掘和書寫歷史記憶的副主題。

儘管人物的命名方式同樣指向東北的歷史記憶,但魯東山與楊平山在形象塑造的手法上却有著顯著的差別,簡而言之,前者是對原型人物張子富的藝術加工和再創造,後者則是蕭軍圍繞著前述“平頂山慘案”幸存者這一先在的核心身份虛構而成的人物。不僅如此,用主人公魯東山的話說,楊平山和艾秀春是“一小從千家山日本人刺刀下一同逃出來的兩塊肉”,^⑤蕭軍將小說三號人物艾秀春的核心身份也設定為“千家山慘案”(平頂山慘案)幸存者。雖然作家後來分別為他們選定了原型人物,楊平山的原型人物是撫礦電鏟司機劉洪林及其搭檔“掃道工”李文生(融合二者),艾秀春的原型人物是在 1950 年 9 月和張子富一起獲得全國勞動模範稱號的撫礦醫院婦產科助產護士張秀英,但是考其出身,劉洪林“1925 年生於河北省寧河縣一個工人家庭,1946 年到撫順西露天礦西大卷採煤班任 3 號電鎬司機”,李文生 1905 年生,河北唐縣人,1933 年來到了撫順西露天礦,為掃道工;^⑥而張秀英則是遼寧省遼陽縣人,1930 年生,1945 年祖國光復後才來到撫順,進入礦務局衛生技術學校學習,^⑦顯然他們都未親身經歷過 1932 年 9 月的平頂山慘案。除此之外,小說中還出現了一位綽號“楊七郎”的“採煤工”,全家三十幾口人均在平頂山慘案中罹難,只有他是唯一的幸存者。而這個在小說中只孤立地出現過一次的人物,其所承擔的全部敘事功能似乎就是記憶和講述:“把他底故事和他家族慘死的故事,說過有一千遍,他企圖每一個字全牢牢地釘進他底兒女們底記憶中。”^⑧如是觀之,蕭軍想要講述平頂山慘案的迫切心情已經躍然紙上。

不難理解,如果只是為了順應潮流而創作以工業鬥爭為題材的作品,那麼蕭軍這部小說本不需要設置楊平山這一人物,更不必引入書寫東北歷史記憶的副主題。顯然,彼時蕭軍的關注重心不僅

在於工業,更在於東北,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在中國亟待開展大工業建設的新形勢下重審東北的歷史地位,而這其實是延續了作家在延安時代就已開始的有關“東北/人”問題的思考。考究起來,雖然蕭軍在延安時期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一直是研究者矚目的焦點,但其中的“東北因素”却並未受到應有的關注。在1944年4月28日的日記中,蕭軍記載了當天下午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彭真對他的第一次“批評”：“你的《八月的鄉村》沒有問題,是革命的,你在延安解放報上發表的文章也是革命的,但有時候你却總不能和黨靠攏,有時甚至是對立的……這就使我懷疑了。同時又知道你認識一些不好的人,又是從東北來的……也許和日本人有些關係罷?”^①

值得注意的是,彭真此處所言的“又是從東北來的”絕非個人的質疑,而是體現了彼時延安幹部甄選工作中一種帶有普遍性的看法。就在此前一天,胡喬木在約見蕭軍討論其入黨問題時,“最後也談到羅烽、白朗兩夫妻,他們正在被懷疑中,並希望我幫助校方理解他們。我說回來看到他們那樣子感到很沉痛,因為是朋友,我沒懷疑過他們,但自己也確是沒見過他們有什麼反革命‘實迹’”。^②羅烽和白朗是蕭軍早在哈爾濱時期就已並肩戰鬥的摯友,後來更是成為“東北作家群”的主力,如今他們在政治上竟然成為被懷疑的對象,這不能不讓蕭軍深感“沉痛”。而當其承彭真坦誠相告,知悉自己不被信任,原來也與自己的東北人身份有關,這對於一直以東北革命作家翹楚身份行走於延安各界的蕭軍而言,無疑是巨大的心理震撼。

在1944年6月3日的“甄別討論會”上,羅烽和白朗激動地控訴了此前“搶救運動”中某些人對他們的陷害,其中有關白朗在東北“曾和日本人睡過覺,甚至說她一家全是‘特務’”的污蔑更是惡毒得令人髮指。而蕭軍在隨後的發言中,不僅以見證者的身份解說了羅烽和白朗的歷史,更是揭示了外人幾乎無法想象的彼時東北“抗日反滿”鬥爭的殘酷性,這樣的講述喚起了大家共同的記憶,羅烽和白朗都“不能克制地哭了”,就連蕭軍本人也不禁潸然淚下。蕭軍的發言大意如下:

回想起在哈爾濱一些朋友、同志……如今死的死了,無消息的無消息,僅僅餘下了幾個人,他們千辛萬苦逃出了敵人各種侮辱和迫害,身上還帶著敵人所給與的未好的瘡疤來到延安,滿想把自己最後一滴血加進革命隊伍裡來……誰想到所得的却是如此的結果……不管他們的理性上如何明白……但在一生的靈魂上究竟是一個可悲痛的負擔……至於那說白朗和日本人睡過覺的人,如今退一萬步說,即使如此,是為了什麼呢?為了把一個於革命有用的丈夫送回革命隊伍裡來,這行為是偉大的,這和說這類話的人是能夠並列的,前者不獨失掉了一個黨員的資格,也失了為“人”的資格。^③

“瘡疤”竟然成為“罪狀”,事後看來這是何其荒謬的諷刺,而對於當事人而言又是痛何如哉!此後隨著幹部甄別工作的深入開展,蕭軍通過親身參加甄別討論會獲知了越來越多有關東北幹部曾被調查甚至誣陷的消息,並且發現諸如“東北人全是特務”之類的謠言,也並非悠悠之談,而是出自某位中央黨校三部領導之口,且因言之鑿鑿,竟有三人成虎之勢。^④尤有要者,當年6月28日蕭軍在參加一個有關復審運動的小組漫談會時再次從旁得知,黑丁曾在坦白大會上指認其為日本特務,為此他特別“嚴正地向支部方面”提出申請,要求“證實這句話的真實性”。而這種種有關“東北/人”的“徵候”,也讓蕭軍進一步意識到了政治上的風險,由此謹言慎行,“省得弄一些糾紛”。^⑤

除了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等左傾思想作祟,上述在延安特殊時期出現的有關“東北/人”的錯誤認識,其實還有著更為深遠的歷史和文化原因,這不僅體現出彼時“東北/人”作為一個游離於關內主流文化的“內部他者”的曖昧身份,更是折射出近代以降中國在建構現代民族國家認同過程中遭遇的嚴峻挑戰。檢視蕭軍延安時期日記可見,他對此問題已經有著相當深入的思考。1940年10

月10日,憤於日前所見一位“東北”詩人“被壓抑”的遭遇,蕭軍“忽然要想有一個同鄉組織,使別人再不敢另眼相看”,進而產生“一個興奮的夢”,那就是“以東北人(文藝工作者)為首,再擴張,造成一種運動。第一步和群(引者按,舒群)他們商量,每月十九日(魯迅先生忌日)舉行一次‘東北文藝工作者座談月會’,以東北作家為限。第二步開展新英雄主義運動。第三步組織東北武裝文化挺進軍”。²⁹而在翌年7月6日東北救亡總會延安通訊處主辦的“前方歸來”將士招待會上,“一個人乾枯地報告了他們的功績,一個說了東北人被同化於日本帝國主義,自稱是‘滿洲國人’”,而臨近偽滿洲國前線地區的關內老百姓則都“非常憎惡東北人”。正因為諸如此類的“功績”以及對於全體東北人的污名化,經常出現在彼時延安有關東北情況的報告會中,使得熱切期盼故鄉訊息的蕭軍每次“參加這類場合”內心“總是矛盾的,明知是無意思”,但總忍不住要去“看一看”。³⁰

1941年7月18日,在與毛澤東、任弼時、聶榮臻等中共領導人的交流中,蕭軍也與他們“談了一些收復東北的事,張作霖的事,張學良的事等”,然而通過這次談話,蕭軍發現除了毛澤東之外,“其餘的人對東北的事是少知而隔閡的,我覺得我比他們好像知道得更多些”。³¹不僅如此,蕭軍發現在當時中共領導層中還存在著某些地方畛域之見,在他看來,中國共產黨需要“一種雄渾的、沉潛的、深刻的大力的東西”,³²整個國家和民族也需要借此獲得新生,而在此過程中東北文化理應作為一種獨特的民族精神資源被尊重和接納。不過,接納的前提是批判,作為一位堅持啟蒙精神的作家,蕭軍對於東北文化有著深刻的反思乃至自我警醒。前述蕭軍“每月十九日(魯迅先生忌日)舉行一次‘東北文藝工作者座談月會’”的設想,應該就是一種以魯迅思想武裝東北作家的嘗試,而當1941年9月9日羅烽前來商議在“今年九一八十週年成立一東北作家組織”時,蕭軍特別提醒其“不要使別人感到畛域”,並且建議“以‘鄉情座談會’為形式,名為‘九一八文藝社’”。³³隨後該社於9月12日正式成立,以“研究東北歷史、語言、習慣”、“聯絡各地東北文藝工作者”以及“收集各類與東北有關的資料”為主要任務。³⁴而以“九一八”的歷史記憶來統合東北作家和書寫東北歷史,顯然是將“東北”放置在民族—國家救亡圖存的整體性視域中重新定位和思考。尤有要者,蕭軍還曾在當年12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某些“東北人是一種奴性的,原始性的勇敢,從這裡我得到了很多警惕:一定要多讀書,使一些浮光掠影消除淨盡,要練成通過理想的勇敢”。³⁵

時隔數年之後,從延安返回東北的蕭軍四處發表演講、創辦魯迅文化出版社、主編《文化報》……,幾乎一度實現了自己當初“組織東北武裝文化挺進軍”的夢想,但隨之而來的則是由中共中央東北局組織的思想狙擊,由此帶給他的何止是功虧一簣的遺憾,更有思想深處新增的瘡疤。如所周知,這次批判由《文化報》與《生活報》的論爭引發,而對於這場論爭,蕭軍在當時就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指出其主要矛盾在於“文化思想上領導權問題”。³⁶現在,作為“中國人”和“東北人民底子孫”,蟄伏於撫礦的蕭軍仍將“為真理而奮鬥”作為“自己歷史的使命”,而文學則是其僅存的武器。³⁷如果說平頂山慘案是東北人民心中最大的瘡疤之一,那麼揭開這一傷疤所隱藏的歷史記憶,將會呈現出東北近代以降獨特的歷史命運,而延安特殊時期個別人對於東北的誤解甚至污名化,也必然就此消解。不過,蕭軍借此想要撫平的創傷記憶,又豈只是東北人民心中的瘡疤而已。

二、“血寫的真實”

儘管平頂山慘案曾經“轟動全國”,³⁸蕭軍對此也應有所耳聞,但其真正深入瞭解到慘案的詳情並為之震撼,却是來到撫礦以後的事情。1949年3月6日,蕭軍在與“一群修理地鑽工人”的“閒談”中,聽他們“講了‘平頂山’的故事”:

距現在十幾年前，在撫順露天坑東南面，有個平頂山村，一次秋天“大刀會”來了，那村中日本經營合作社人跑了，有的人拿了麵粉，待大刀會走了，村人被控告，於是日本兵挨家搜查，凡有面的即被逮捕，那正是八月節時，每家全有些面，於是所有一千多人全被趕到山上跪下，於是炸藥全轟了，有一家五口僅一小孩被留下。後來那村莊也燒了，所有死的人就埋在那裡，圍以鐵絲，後來那裡做了路基，還掘出過銀鐮子與銀元。³⁴

從上述記載可見，蕭軍當時已經注意到了這個故事中的一個重要細節，那就是“有一家五口僅一小孩被留下”，而正是由此出發，作家後來在《五月的礦山》中設置了楊平山和艾秀春“千家山慘案”（平頂山慘案）幸存者的身份，以及兩者之間交織著兄妹之情與男女之愛的複雜情感關係。到了當年5月6日夜，蕭軍隨“工作員們”去填充班大房子（工人宿舍）“串門”，再次聽到一位工作員講述“一九三二年撫順栗家溝平頂山事件”：

大刀會於八月（古曆）十五日十一點四十五分由南花園，栗家溝攻進來，第二天退走，接著日本人把平頂山一千多戶，兩千多人全趕到一起，火燒了房子，把所有的人用機關槍圍射，而後用刺刀穿，每人兩刀，而後由朝鮮人剥衣服，搜錢財，於是用火藥在山頂上轟出一個坑，結果造成一個“千人塚”。據說此次只僥幸逃出七十多人。於是人又痛恨朝鮮人……他們幫兇。³⁵

由此可見，《五月的礦山》中“千家山”的地名也並非完全出自蕭軍的杜撰，而是化用了“千人塚”的史實。而在聽了工作員的講述之後，蕭軍再次深受觸動，並“決定要把平頂山故事記錄下來”。³⁶為了進一步發掘這段歷史，蕭軍又在次日“晚飯前和十幾個工作員去平頂山參觀，由李潤之領著，講說著那次日本人屠殺中國平民的地點和情況，他曾在那裡住過。如今那村莊已成了一片大球場，主要街道及水溝已有坭子道及鐵道鋪，增高了。……被燒平的村莊地方曾被國民黨挖掘過，照了相，又被埋起來。附近還散落一些燒焦，風化了的人骨片。一個隊員還拾到類乎嬰兒兩段腿骨。他們全顯得很激憤”。³⁷顯然，這次帶有田野調查性質的考察不僅讓蕭軍更為接近了事實的本相，並且從人們那“激憤”的情緒中感受到了歷史的力量。出於對這一事件的重視，蕭軍在翌日上午又請“起重工人李潤之講述了平頂山慘案經過”，並“扼要地把它記錄下來”。³⁸繼續檢視蕭軍日記可知，這位李潤之是蕭軍所屬工會工作隊的成員，“純樸，深厚，正直，剛強，毫無俗氣和油滑的地方”，蕭軍不僅對其評價甚高，而且認為彼此之間有著一種“很深沉”的情誼。³⁹以此推想，蕭軍在日後的寫作中，對於李潤之講述的“平頂山慘案經過”應該格外重視。

前引“被燒平的村莊地方曾被國民黨挖掘過，照了相，又被埋起來”一語所指不詳，有待索解。檢視彼時媒體的相關報導可知，此為1947年7月30日國民政府主席東北行轅軍事法庭組織之平頂山殉難者遺骸發掘工作，由庭長岳城安親自主持，“搜集罪證，以備清算此一大血債”，隨行記者亦有對於幸存者的採訪發表，而二千七百餘名遇難同胞，在沉冤十五年之後，終於得到了祖國的怙恃並即將迎來正義的審判。⁴⁰在此之前，儘管以胡水波的短篇小說《平頂山》（1933）和芝岡（黃芝岡）的同名詩歌（1934）為代表，有關平頂山慘案的文學重述已經構成了一個獨特的文學譜系，⁴¹但就這一文學譜系乃至創傷記憶的史源而言，最主要的文本只有兩個：一是1932年12月19日《北平晨報》以《撫順屠殺——美人漢特日擊記》為題，譯載之美國國際新聞社記者漢特（Edward Hunter）當年11月30日根據實地調查撰寫並發表的外電，12月23日《申報》復以《日軍在撫順屠殺慘狀》為題轉載；二是1932年12月22日《大公報》、《華北日報》、《北平晨報》等媒體揭載之有關平頂山慘案幸存者張榮久“於昨日逃來北平後，對於記者詳述當時日軍暴行情況”的新聞通稿。換言之，

此次東北行轅軍事法庭組織之殉難者遺骸發掘工作，讓國人在經歷了十五年的漫長等待之後，終於再次聽到了從平頂山慘案遺址現場傳回的聲音。現有的研究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官方組織的首次有關平頂山慘案的紀念活動，是1951年3月2日撫順市政府召開的由15名平頂山慘案幸存者參加的座談會，“這也標誌著平頂山慘案幸存者揭露、討伐日軍的侵略罪行和對日訴訟歷程的開始”，隨後的4月5日，撫順市市長張澍作為主祭人，率領全市“各界代表一萬多人在平頂山的搭祭靈台前，敬獻挽聯和花圈”。^②而早在1949年春，蕭軍就已經開始以自己的方式觸摸平頂山慘案，不能不說他對於東北的歷史記憶和民族的深重苦難有著深切的關懷與用心的體察。

不難看出，從在不經意的“閒談”和“串門”中聽到“故事”，到現場實地考察，再到請“曾在那裡住過”的工人更為全面和深入地講述事件經過，蕭軍對於平頂山慘案的調查不僅做到了多方瞭解，參合研判，而且特別注意觀察和分析在地者對於這一慘案的態度與解讀，以及這一創傷記憶被轉化和講述的方式與方法，不無今日所言歷史人類學的意味。因此，蕭軍在小說中對於平頂山慘案的書寫並未止於自然主義式的實錄，而是有著自己的選擇和開掘。比如在上引修理地鑽工人講述的平頂山慘案故事中，本有某些村民趁亂到日本人經營的合作社“拿了麵粉”，遂引發日軍無差別報復的情節，而如此戲劇化和簡單化的解釋，或許正反映出彼時村民生存資料的極度匱乏，但其最終沒有出現在小說敘事當中，此非曲筆，而是作家批評性地分析素材的結果。與之相比，在工人們前後兩次的講述中都曾出現的“大刀會”，則被蕭軍在小說中保留下來，並加以更為詳細的敘述。雖然所用筆墨不多，但蕭軍還是勾勒出這支“抗日的人民武裝隊伍”進攻撫順的戰鬥過程，並且特別設置了一個飽含深意的細節，那就是“抗日隊伍也有了很嚴重的損害和傷亡！犧牲者的屍體，有的就匆忙地被掩埋在千家山附近的野地裡”。^③而在有關千家山/平頂山慘案的敘述之前，小說還有一段帶有引言性質的對於“九一八”事變的評述，蕭軍在此化用了魯迅“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無花的薔薇之二》，1926）這一名言，指認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在執行“不抵抗”和“消極抗日”政策的過程中，“冷淡國內外人民對東北人民底同情和援助，隔絕東北人民英勇抵抗的消息和真實的戰績”。^④透過這一帶有鮮明時代印記的“反蔣”話語，我們能夠看到蕭軍著力發掘和呈現東北人民英勇抗日並付出巨大犧牲的歷史真相的迫切心情，而那些在千家山捐軀的抗日志士不正是以“血寫的事實”留下了東北人民孤軍奮戰的抗日史迹嗎？

值得注意的是，這支名為“大刀會”或“大刀隊”的抗日武裝，本以“民間封建迷信組織”為班底，後經首領王彤軒改造，“以抗日救亡為號召，改稱救國軍”，並“加強武術訓練”，使其成為彼時當地抗日武裝中的一支“強悍部隊”。^⑤正如蕭軍在小說中所言，這支隊伍代表了任何國內外反動勢力都無法消滅的“烈火似的，漫山遍野熊熊烈烈地旋轉著、燃燒著”的“人民的力量”，同時也真實反映了“九·一八以後，在東北各地人民的武裝，以各種形式和名稱到處生長著”的抗日鬥爭現實。不必說，這樣的“抗日的人民武裝隊伍”在當時並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其實，通過在小說中介紹抗日武裝領導方面的複雜性，蕭軍對此已有間接的說明，並且特別強調指出，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主流才能“戰鬥著、匯流著、前進著……一直到今天”。^⑥儘管如此，根據蕭軍1954年5月25日給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編輯的回信推斷，書稿所涉“東北義軍領導問題”，仍然受到了該社總編室的質疑，而蕭軍則以“這是當時歷史的真實，我想提出來是無疑的”為由，堅持了自己原來的書寫，^⑦“大刀會”及其“血寫的事實”由此才被留在/置於中國當代文學的抗戰敘事當中。

除了“大刀會”，在工作員講述的平頂山事件中還有一個關鍵的細節，那就是日軍大屠殺後“由朝鮮人剥衣服，搜錢財”，於是村民在事後“痛恨朝鮮人”，認為他們是日本人的“幫兇”。其實，早在

1932年12月19日《北平晨報》譯載之《撫順屠殺——美人漢特目擊記》以及前引《大公報》所載《十五載沉冤未雪 平頂山遺骸發掘》兩文中，已有慘案幸存者指認某些朝鮮人在這場大屠殺中犯下了罪行。另據撫順市政協文史委員會在1987年重新整理并發表的《撫順平頂山慘案考》一文所述，慘案發生後，某些“朝鮮浪人”和“韓國僑民會人員”在日本侵略者的主導下完成毀屍滅跡的工作，“從此平頂山變成了一座人骨堆積的荒山”。⁴⁸

然而，以更為深遠的歷史眼光來看，上述的罪行正體現了彼時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朝鮮人民的武力脅迫、分化瓦解和思想毒害，同時也暴露了其在中朝人民之間長期製造和挑撥民族矛盾的陰謀詭計。曾有研究者指出，自日本政府於1938年4月正式頒佈“特別志願兵”制度直到二戰結束，“7年內日本軍部總共招收了10餘萬朝鮮籍官兵，其中有近3萬名加入侵華部隊，隨日本殖民者一同踏上中國土地”。⁴⁹而在1935年秋在華朝鮮共產黨人聯合其他革命者通過的《朝鮮民族陣線聯盟綱領》中，對於上述問題也有明確的指示：“（丙）那些充當日本帝國主義的工具，散佈在中國各地的受雇用的朝鮮人，也受日本的壓迫（為了謀生而從事販賣鴉片、賣淫和走私等等），時機成熟時，我們必須採用特殊的方法，領導他們轉向反對他們的日本帝國主義雇主。”⁵⁰

而在《五月的礦山》中，蕭軍並未不加分析地“實錄”特定族群的罪行，而是對其採訪得來的口碑史料進行了超越“生活事實”的文本化處理：

而後，日本兵就趕來了附近一些貧窮的朝鮮居民們，命令著他們強迫著他們剥光那些屍體上血污的衣服碎片，揀出那偶有的孩子們底小手鐲，女人們底銀耳環，牙齒上的金包皮，以及偶有的財物。這些朝鮮居民，有的企圖拒絕，不肯去那樣做，日本兵就用槍柄敲打他們底背脊，用刺刀戳他們底腿或手；再頑強拒絕的，他們就一槍打死了他，和中國人民的屍體一樣地倒下去，一樣地被剥光，被一道拖到那小山根底下，拋進那事先掘好了的、半天然半人工的小谷裡面去。而後，就把那在小山丘三面早已埋好了的黃色炸藥底引信點燃了，於是轟地一聲，整個半段小山丘就崩落下來……把那塞滿了屍體的小谷填成了一尊巨大的墳！⁵¹

顯然，蕭軍在這裡並沒有將平頂山慘案中的朝鮮人因素簡單化和模式化，而是將朝鮮居民塑造為和中國居民一樣的反抗者和受難者，就像生前曾經和中國居民一起擁有共同的家園一樣，死後他們和中國居民共同構成了有關“千人塚”的苦難記憶，而日本軍國主義者則是他們和中國居民共同的敵人，給包括中國、朝鮮在內的亞洲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考慮到蕭軍在1951年6月開始動筆寫作《五月的礦山》時，朝鮮戰爭已爆發一年有餘且中美兩軍正處在鏖戰之後的對峙當中，上述有關平頂山慘案之朝鮮因素的敘事，或許不無“同仇敵愾”的現實政治訴求，但這並非其主旨所在。追溯起來，蕭軍自少年時代起就對以安重根為代表的朝鮮愛國志士仰慕至深，借此形成了自己樸素的愛國主義思想，⁵²自1930年代初進行革命文藝活動以來，更是對這個雖然失去祖國但却頑強抗爭的“弱小民族”深表同情。1943年7月6日，蕭軍在河邊聽到了一位剛從東北來到延安的朝鮮姑娘和兩位男青年合唱“朝鮮的《阿里郎》民歌”，這使其“想到了一個人流浪到異國的哀淒”。⁵³當年9月初，他又在家裡遇見了兒子的兩位朝鮮小伙伴，這一對姐弟“雖然樣子還像朝鮮人，他們的言語已經習慣中國的了”，這讓他再次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感情”，並寫了一句舊體詩表達感慨，“故國淪亡三十載，漂流兒女已成行”。⁵⁴而對於同樣失去故土的蕭軍而言，這些流亡異國的朝鮮人何嘗不是一個鄉愁的印記。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一位時刻關注著故鄉抗日鬥爭形勢的東北作家，蕭軍在1942年初不無驚

喜地遇到了曾任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軍長的李延祿，並與之時相過從，而“東北情形”自然也就成為二者交流的主要內容。⁵⁵李延祿曾長期在吉林延邊地區領導抗日鬥爭，對於加入“抗聯”的朝鮮抗日志士和當地愛國朝鮮移民的情況非常熟悉，其於1938年末抵達延安，自翌年元月起擔任中國共產黨東北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主要負責“收集整理和總結東北抗日鬥爭的資料供領導機關參考”。⁵⁶因而，蕭軍很可能從李延祿那裡獲知了不少有關在華朝鮮人抗日鬥爭的信息，而這對其建構在華朝鮮人的正面形象想必助益良多。綜上所述，蕭軍在《五月的礦山》中，其實是從救亡圖存的視角和國際主義的意識出發，將平頂山慘案中的朝鮮人因素放置在更為寬廣的歷史背景中理解，並且通過創造性地改寫，將其整合為東北人民乃至中國人民共有的歷史記憶的一部分。

三、“怎樣在思想上武裝我們底人民”

小說中，蕭軍在敘述了千家山慘案之後，用充滿溫情的筆觸描寫了千家山的人們在災難之後的重生：“那當年的一切，似乎早已成了自然的陳迹，可是那被毀滅了的人們底後代，他們今天却依然存在著，他們和他們父母所生活的‘黑色年代’已經絕了緣，那黑色年代是一去不復返了。楊平山和艾秀春他們正在金光四射、萬花齊開、綠草連天……的時代的大草原上開始生活著、工作著。讓死者底仇恨、變為生者的力量罷！”⁵⁷由此，我們也就能夠理解“艾秀春”之名的內涵。艾，即艾蒿，不僅是驅邪祛濕的良藥，也是君子比德的“香草”，而“不容而實者謂之秀”（《爾雅》），可見蕭軍是以在春日煥發生機的艾草，比擬這位雖然遭遇被日本侵略者奪去父母和貞操的苦難，但却不向命運低頭並保持靈魂之驕傲的姑娘。在《千家山——仇恨底歷史》這一章中，敘述人其實只用了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追溯千家山“仇恨”的歷史，餘者則是重在展現楊平山和艾秀春在東北解放後獲得的思想成長，可見蕭軍對平頂山慘案的歷史記憶有著超越仇恨的獨特理解。

不言自明，作為一位曾以《八月的鄉村》為關內文壇帶來抗日烽火的東北作家，書寫東北的歷史記憶一直是蕭軍念茲在茲的文學主題和光榮使命，此前（基本）完成的長篇巨製《第三代》和約兩萬行的敘事詩《烏蘇里江西岸》均是這一脈絡中的產物。不過到了構思《五月的礦山》的時候，蕭軍對於書寫東北之歷史記憶的現實意義有了新的更為深入的思考。1949年7月7日是“抗日戰爭十二週年紀念日”，蕭軍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下午雨後，燈泡廠秧歌隊那些青年人全心全力全生命扭秧歌的熱情，使我感動得流淚了！為了中國人民的“新生”，我必須要拋棄自己一些陰暗感情，為他們而工作啊！

看到報紙上載美國扶植日本法西斯的陰謀，我斷定了，中國和日本以至美國之間，一定要不免一次殘酷戰爭啊！中國人民一定還要經過一次殘酷而嚴肅的考驗啊！為了要警覺人民這思想，我必要放棄個人和共產黨之間的隔閡，無論如何它是領導中國革命唯一的可靠的力量，……只要它革命為人民解放……我一切準備忍受啊！我只求得中國人民不為奴隸！——我要以此為主題寫一部警惕的書！⁵⁸

所謂“看到報紙上載美國扶植日本法西斯的陰謀”之說，指的應該是當日《東北日報》的相關報導和論述。⁵⁹也就是在當天的日記中，蕭軍終於確定了“要寫的作品時間”——“由五一到七七”，而其中設定的一個角色則是“曾被平頂山慘殺者”。⁶⁰此處所言的“要寫的作品”就是《五月的礦山》，而如前所述，那個“曾被平頂山慘殺者”就是後來的楊平山。由此再聯繫到蕭軍將“七七”抗戰紀念日作為小說被敘述時間的終點，可見其當時依據有限的官方媒體的相關報導，形成了自己對於國際局勢的判斷，進而帶著對於中國未來命運的警惕和憂慮，在自己的小說中展開了對於平頂山慘案這

一歷史事件的思考。而蕭軍將“五一”國際勞動節作為小說被敘述時間的起點，也是自有深意存焉。作家曾在1949年5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

這裡燈泡廠的秧歌隊，全是十七八歲的青年人。我看著這些孩子們全心全意，全生命力地表現喜歡[的]美妙的喇叭聲音，我的眼睛浮上淚來了！我們中國人民得到了新生！中國青年得到了新生！我必須要從今天起放棄自己那些執拗的、陰暗的、繁瑣的，卑俗的……個人的不愉快，個人的感情，全心全意、全生命力地……為他們工作吧！只要不讓中國人再做奴隸，我個人什麼委屈全應該忍受啊！一切為人民，……淚水又浮上了我的眼睛！

……

幾十年來，中國人民才過了這心靈上，生活上，無了顧慮和壓迫的第一個節日。^①

同樣是燈泡廠的秧歌隊，同樣是“全生命”地表演，同樣是感動的淚水，從這兩處重要細節和核心表述多有“雷同”的記載中，可見蕭軍一直將覺醒並煥發生命生機的人民，視作實現民族和國家復興的力量源泉，而致力於中國人民的思想新生，則是其矢志不渝的追求。^②在1949年7月27日的日記中，蕭軍再次發出戰爭的預警並叩問自身的責任：“美國在加強台灣掠奪與軍事化日本和東亞各島，這是戰爭的準備，這將是最殘酷的也是最後一次戰爭罷。我將要怎樣在思想上武裝我們底人民呢？”^③如所周知，距離蕭軍寫下上述文字的時間不到一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不得不抗美援朝，打響了又一場國運攸關的苦戰。在這一對於國際形勢頗具預見性的判斷中，蕭軍將“怎樣在思想上武裝我們底人民”視作當務之急，這為我們理解《五月的礦山》獨特的歷史記憶書寫提供了新的線索。

雖然蕭軍最後將小說的被敘述時間調整為1949年5月1日至8月16日，但他借由敘述人之口特別指出，在8月16日召開的“全烏金礦區各礦、廠勞動模範工作者的大會”的“前一天為八一五，是中國東北四省解放四週年紀念日”，且曾引得整個烏金市徹夜歡慶。可見作家雖然將抗戰紀念的“起點”替換為“終點”，但有關抗戰的歷史記憶仍是小說的重要主題之一。不僅如此，敘述人對於“五一”這一被敘述時間的起點也有特別的解釋，這天其實是烏金市召開“五一勞動節五四青年節紀念大會”的日子，因而“不獨紀念五一勞動節，同時也紀念五四青年節”。^④行文至此，小說內蘊的“五四”啟蒙精神已經呼之欲出。

讓我們將目光轉向小說第四章《千家山——仇恨底歷史》的結尾。根據敘述人的交待，楊平山和艾秀春都曾到烏金市或礦務局“總工會所辦的短期訓練班去受訓”，並由此獲得了思想上的新生。而班上“每一個講課的人，他們總是熱情地希望聽者能夠增長智慧和聰明，能懂得他們自己，懂得工人階級的任務，懂得敵人的罪惡，懂得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以及眼前應該怎樣進步、做些什麼”。^⑤可見蕭軍最希望楊平山和艾秀春學到的能力，其實就是“懂得他們自己”，而這也正是作家至為期盼的啟蒙願景。

另外，細心的讀者或許已經發現，敘述人在描述魯東山去醫院探望楊平山的場景時（這也是後者在小說中的首次登場），楊平山曾隨手拿起一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而從其“凝視著那封面”的細節來看，^⑥蕭軍暗示出該書對於楊平山的思想形塑有著重要的影響。眾所周知，該書是根據劉少奇1939年7月在延安馬列學院的演講整理出版的一部重要的黨內文獻，首發於當年8月至9月的《解放週刊》，隨後於11月由延安新華書店出版單行本，1942年2月延安整風運動開始，該書成為“黨員幹部必讀學習的22個文件之一”，1943年該書又被節選收入《整風文獻》，從此成為中國共

產黨的理論經典著作。⁶⁰而就在蕭軍構思《五月的礦山》的前夕，學習《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又成為彼時東北各大公營企業組織的黨員幹部乃至非黨員幹部“政治教育”的主要內容之一。⁶¹可見蕭軍在小說中嵌入該書，不無“生活事實”的依據。

而早在1942年7月4日，蕭軍就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再次“仔細讀完”，並作為彼時自己開展思想鬥爭的理論武器。⁶²以此推考，蕭軍在《五月的礦山》中嵌入該書的動機，仍是希望借此引入反教條主義和反剝削、反特權思想的話語。劉少奇在書中強調，一方面共產黨員作為“覺悟的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他應該表現他為自覺的階級利益、階級意識的具體代表者，……也表現他們為整個民族利益的最好的代表者”，而另一方面，黨“不能也不應消滅黨員的個性，……黨而且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去幫助黨員個性與特長（於黨有利的）發展，給他以適當的工作與條件，以至加以獎勵等”。又因為無產階級具有解放全人類的崇高理想，他們堅決摒棄任何的剝削思想和特權意識，“他們一方面固然要用最無情的手段對付人民公敵，但另一方面絕不使用這種手段去對付自己的兄弟與同志”，“他們有堅定的嚴格的原則立場，光明、正直而嚴肅的態度，不能在原則上有任何讓步，不能容許別人對黨的利益有任何損害，也不能容許別人對自己的無禮侮辱，尤其鄙視別人對自己無原則的過度的奉承、阿諛和諂媚”。⁶³可為旁證的是，1948年春，蕭軍在發表於自己所主編的《文化報》上的一篇反對“不自由主義”的文章中，曾經大段直接引用劉少奇1945年7月在《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舉過的“一些實例”，對於劉少奇有關反教條主義的“透闢而英明的解說”深表服膺，認為“它不獨適用於黨內，如果推廣起來，它甚至完全適用於各機關、各學校……以至於每個人。如果誰還迷醉於那種‘命令主義’……等等的‘美夢’，這將要‘吃不開’”。⁶⁴

在蕭軍看來，像楊平山、魯東山這樣的普通一線工人要想獲得工人階級應有的品質與覺悟，並且能夠保障自己的權益和尊嚴不受侵犯，離不開堅持不懈地學習文化知識、提升思想水平。比較起來，魯東山在小說的三位主要人物中可謂最具“實錄”意味，不過比之於原型人物張子富，還是有很多變化，其中一處特別值得關注的改寫就是其文化水平的“降級”。蕭軍日記中描述的張子富雖然“沒讀過書”，但在實際工作中鍛煉了他的“智慧和聰明”，不僅口才不錯，可以在大庭廣眾之下完成主題明確、條貫清晰、邏輯嚴密的脫稿講話，⁶⁵而且粗通文墨，能夠閱讀諸如《掘煤技術入門》之類的煤礦專業通俗讀物。⁶⁶但在小說被敘述時間的起點，魯東山卻是一個拙於語言表達的半文盲，不過到了小說被敘述時間的終點，他經過實際工作的鍛煉，不僅追上了張子富的口才，並且下定決心繼續努力學習文化，而從其“旁若無人地連猜帶測地”朗讀報上有關礦上勞動競賽消息時表現出的自信來看，⁶⁷像張子富那樣可以通過閱讀來提升自己應該指日可待。

在《五月的礦山》中，敘述人通過魯東山在小說首尾處分別進行的兩次從“無”（慌亂）到“有”（從容）的講話，以一種前後對比和相互呼應的方式，揭示出這位勞動英雄在思想成長的過程中所經歷的艱辛與喜悅。⁶⁸而比讀蕭軍在1949年8月16日日記中的有關“撫順礦第一次勞模大會”的記載，可見上述有關魯東山先後在“五一勞動節五四青年節紀念大會”和勞動模範工作者大會上講話的情形，或許是化用了作家對於張子富和撫順另一位“特等勞模”夏希仁在“勞模大會”上所做報告的觀察，而正是從他們的報告中，蕭軍欣慰地看到了“中國的勞動人民在成長”，並且發出了“未來的中國他們是脊梁”的讚嘆。⁶⁹蕭軍研究專家張毓茂先生曾經指出，“艾秀春和魯東山、楊平山等都是在偉大的社會主義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新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五月的礦山》也可以說是一曲新人的頌歌”。⁷⁰這無疑是非常恰切的評論，但我們在此基礎上還應該注意到，蕭軍為這些“新人”灌注了以魯迅精神為代表的啟蒙理想，那就是自立自強，剛健有為，富有生命的活力，擁有健全

的靈魂。而這也就是作家對於前述“將要怎樣在思想上武裝我們底人民”的自我追問給出的文學答案,同時也讓我們更為深刻地理解了蕭軍在《五月的礦山》中書寫歷史記憶的現實意義。

結 語

在《五月的礦山》中,以魯東山、楊平山和艾秀春為載體的“仇恨”,共同指向了日本在甲午戰爭以後就已開始的對東北的全面殖民擴張,及其遠在中國全面抗戰之前就已製造的以平頂山慘案為代表的血腥屠殺。而東北人民的這些創傷記憶,終將匯流為全體中國人民的歷史記憶,也只有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整體性視域中,“仇恨”才能得以消泯和昇華。顯然,正是通過“闖關東”這樣的大規模人口遷徙與深度文化融合,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設獲得了堅實的歷史基礎,中華民族的主體性也借此得到了進一步的確立和加強,中華民族因此才有足夠的勇氣和韌性去面對近代以降艱難圖存的境遇。放眼未來,“仇恨”的歷史記憶終將結束,因為它是一個必要的割舍和分斷,由此人們才能獲得新的視野與目標。回望過去,“仇恨”的歷史記憶又永遠不會終結,因為它在啟蒙思想的發酵下已經化作促進民族永續發展的養分,多難的中國及其人民就像艾秀春之名所象徵的那樣,將如春日的艾草般驕傲地生長,邪僻難近,芳香遠揚。

儘管時過境遷,但是蕭軍這些蘊含在歷史記憶書寫中的啟蒙願景仍然讓我們為之激動,而那些始終伴隨著蕭軍啟蒙願景的困境,其實原本就是激發作家寫作的關鍵動力,並使之從這種境遇中進一步認清了自己和時代,其所懷抱的願景,也獲得了繼續修正和提升的可能,儘管作家最終為此承受了外人難以體會的艱辛與苦難。因而,若論其中最值得總結的歷史經驗,似乎又回到了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那就是我們的社會和文化中為何容不下一個革命的“他者”蕭軍?透過今日學界某些專題研究中對於所謂蕭軍性格缺陷的指責乃至嘲諷,可見我們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仍然受限於某些嚴苛的道德標準,這其實是以學術的名義將深刻的思想問題庸俗化,而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曾經遭受的苦難也就以這種方式被遮蔽和遺忘。就此而言,蕭軍本人或許就是一個不無挑戰性的“歷史記憶”,從而構成了另一個頗具現實性的重要議題。

[在本文修改過程中,承蒙四川大學馮憲光教授、延邊大學金柄珉教授和廈門大學盛嘉教授的指教,後又得到本刊匿名審稿人中肯的意見,並此致謝]

①蕭軍:《批評與自我批評》,《蕭軍全集》第17卷,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年,第227頁。

②參見皮埃爾·諾拉:《記憶與歷史之間:場所問題》,皮埃爾·諾拉主編:《記憶之場: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黃艷紅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2頁。

③參見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潘璐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46~147頁。

④參見帕特里克·格里:《作為記憶的歷史》,陳浩譯,《歷史、記憶與書寫》,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39、141頁。

⑤⑥⑨⑩⑪⑬⑮⑱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蕭軍:《五月的礦山》,《蕭軍全集》第4卷,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年,第5、20頁;第12、73頁;第83頁;第5~6頁;第21頁;第25頁;第51~52頁;第49頁;第47~48頁;第48頁;第49頁;第50~51頁;第20、30、226頁;第55~56頁;第24頁;第224頁;第36、240頁。

⑦參見《張子富的歷史》,撫順市職工總會、撫順礦務局職工總會編輯:《撫礦第一次勞模大會輯錄》,遼寧撫順:撫順礦務局,1949年,第7頁。

⑧⑫⑬⑭⑯⑰⑱⑲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參見蕭軍:《東北日記1946-1950》,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657頁;第662頁;第722頁;第409頁;第713

~714 頁;第 596 頁;第 649 頁;第 649 頁;第 650 頁;
第 650 頁;第 665~666 頁;第 722 頁;第 722 頁;第
752 頁;第 771 頁;第 662 頁;第 771~772 頁。
⑭參見《嗚呼撫順慘殺案!》，天津：《大公報》，1932
年 12 月 21 日。
⑮參見撫順市社會科學院編：《撫順市志》第九~十
卷，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0 年，第 443~444 頁。
⑯參見《中華創業功臣大辭典》編委會編：《中華創業
功臣大辭典》，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 年，第
285 頁。
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參見蕭軍：《延
安日記 1940-1945》(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3 年，第 405 頁;第 405 頁;第 436 頁;第 439、441、
443 頁;第 459 頁;第 81 頁;第 209 頁;第 225~226
頁;第 635 頁;第 280 頁;第 281 頁;第 355 頁;第 166
~167 頁;第 219 頁;第 372、377、390、579、588 頁;第
522 頁。
㉡參見《平頂山慘案日要犯已就逮》，南京：《法聲》，
第 127 號，1947 年 7 月 28 日。
㉢參見《十五載沉冤未雪 平頂山遺骸發掘》，天津：
《大公報》，1947 年 8 月 2 日。
㉣參見趙偉：《平頂山慘案：文學視域中的創傷記
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18 年第 5 期。
㉤參見傅波主編：《2006-2007 平頂山慘案研究》，瀋
陽：東北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315 頁。
㉥㉦參見文史辦重新整理、徐桂英執筆：《撫順平頂
山慘案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遼寧省撫順市委
員會文史委員會編：《屠殺集——1905-1945 年間日
本侵略者殘害煤城同胞史料專集》(“撫順文史資料
選輯”第 9 輯)，遼寧撫順：政協撫順市文史委員會，
1987 年，第 43~44 頁;第 40~41 頁。
㉧參見蕭軍：《致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 年 5 月 25
日)，《蕭軍全集》第 17 卷，第 19 頁。
㉨參見沈佳穎：《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戰場上的朝鮮籍
日軍》，上海：《歷史教學問題》，2020 年 1 期。
㉩參見《朝鮮民族陣線聯盟綱領》，尼姆·威爾士(海
倫·斯諾)、金山：《阿里郎之歌——中國革命中的一

個朝鮮共產黨人》，趙仲強譯，北京：新華出版社，
1993 年，第 261 頁。

㉪蕭軍：《我的最後一次檢查》(1974 年 5 月 20 日)，
《蕭軍全集》第 17 卷，第 306 頁。

㉫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中國共
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錄(上)》，北京：中
共黨史出版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9 頁。

㉬參見《努力經濟建設、粉碎敵人陰謀破壞——紀念
抗戰十二週年》、高崇民：《紀念“七七”應有的警
惕》，以及操良、王飛：《美國保護日本侵略勢力復
活》，瀋陽：《東北日報》，1949 年 7 月 7 日，第 1、2、
3 版。

㉭參見蕭軍：《東北日記 1946-1950》，第 643~644 頁。
按，《蕭軍全集》版蕭軍日記此處記載有缺文。

㉮這樣的思想早在蕭軍 1944 年 6 月 24 日和 1947 年
7 月 23 日的日記中就有體現。參見蕭軍：《延安日記
1940-1945》(下)，第 458 頁;蕭軍：《東北日記 1946-
1950》，第 253 頁。

㉯參見劉呂紅等編著：《馬恩經典與百年中國·文獻
研讀》(第二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
43~44 頁。

㉺參見《加強和改善公營企業職員的政治教育》，瀋
陽：《東北日報》，1949 年 3 月 21 日。

㉻參見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延安：解放社，
1949 年，第 54~55、69、71 頁。

㉼參見蕭軍：《春夜抄——“自由主義”與“不自由主
義”》，《蕭軍全集》第 12 卷，第 161~162 頁。原載
《文化報》第 28 期，1948 年 4 月 10 日。

㉽參見張毓茂：《跋涉者——蕭軍》，瀋陽：遼寧人民
出版社，2000 年，第 347 頁。

作者簡介：楊慧，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天津
300071

[責任編輯 桑海]